

## U041 石島紀之老師訪談

時間： 2011 年 4 月 16 日(土) 下午 13：06-16：15

位置： 東洋書庫 1 層會議室

訪問： 大澤肇 (現中部大學助理教授，時為東洋文庫研究員)

關智英 (東京大學研究生院博士候選人)

攝影： 梁雯(東京大學研究生院博士候選人)

翻譯： 邵軒磊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宗旨說明省略)

關口： 您在成蹊高中的教師時代是否曾與台灣人往來？

石島： 完全沒有。在大學裡可能有台灣來的學生或研究人員，但我並不認識的。中日友好協會文京分部中，也沒有中國大陸來的人，所以我也幾乎不認識。到了 80 年代，才認識中國來的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在文革前不久來日本，這是非常例外的事。

關口： 抗日戰爭史研究會時期的研究會的氣氛怎麼樣呢？是對中國的歷史研究的現狀感到懷疑的研究嗎？

石島： 怎麼說呢？ 因為連我自己都處在摸索的階段，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是那麼有深度的議論，反而像是個別互相介紹自己研究中的主題。當時文革剛發生不久，研究會就以對文革批評性的立場開始了。那時候中西功先生等都非常活躍。因為我正在當高中的教師，所以很遺憾的沒有參加，聽說有古厩先生、安井先生、上原先生都參加著以中西先生或者里井彥七郎先生為核心的研究會。

關口： 您從成蹊高中轉職到茨城大學是什麼時候？

石島： 在 1976 年 3 月辭去成蹊高中教職，4 月到茨城大學就任。

關口： 是因為那時候您嚮往大學的工作的緣故嗎？

石島： 我那時候對研究感到興趣。因為高中的教師有很多各種各樣的雜物啊。當時如果可以的話想要加深自己的研究。

大澤： 您提及是因為對實務界比學術研究更感興趣，所以離開碩士課程到成蹊高

中就職。那使您恢復研究的動機和起因什麼呢？

石島： 經由暑期研習營（是否為京都暑期研習營？待確認。），我與日本史及歐洲史的研究者們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覺得當時文革批判研究逐漸展開，所以漸漸有了中國史的研究不再是侷限於象牙塔，而應該可以有更新的方向吧。學界開始摸索和以前的革命史不一樣的研究，與別的領域的交流也逐步深化。儘管《太平洋戰爭史叢書》最後沒有成書，但作為這個的代替品，《體系・日本現代史》 出版了 2 卷(日本評論社、1979 年)。這是我參加暑期研習營和太平洋戰爭史研究的後續成果，寫了〈抗日戰爭〉這篇論文。這論文甚至可以說是成為我《中國抗日戰爭史》一書的雛型。

大澤： 您有受到《講座中國近現代史》的委託嗎？

石島： 與其說被委託，不如說是那時年輕研究者的總召集令啊。我想那時高綱先生等人是最年輕的一輩，也有剛剛開始研究的研究生。說是要完成全 7 卷份量的書，執筆者 61 人、真是總動員阿(笑)。

關口： 您從 1976 年 4 月開始就任茨城大學，是哪位教授的繼任呢？

石島： 是研究中日關係史的石原道博教授(1910-2010)的繼任。

關口： 您在茨城大學裡講授的課是什麼？

石島： 講東洋史概說、演習、史料講讀等課。

關口： 在演習課裡讀了什麼呢？

石島： 有讀過《中國「統一化」論爭資料集》。另外從各時期出版的論文集集中選讀對學生來說有趣味的論文之類的。

關口： 東洋史概說是中國史嗎？

石島： 是中國的近現代史。從鴉片戰爭前後談起。

關口： 學生有多少呢？

石島： 史學教室裡日本史、西洋史、東洋史加總有 20-30 名。 那時候做東洋史的人有 4、5 人。

關口： 東洋史的學生的畢業論文的主題中有過什麼樣的東西呢？

石島： 有以幣製改革為主題的學生。

關口： 聽說您從古代史到現代史，指導全部東洋史的論文？

石島： 是整個亞洲史。因此其中既有寫關於三國志的學生，也有以馬來西亞土著政策(Bumiputra<sup>1</sup>，馬來人優惠政策)為題的學生。

關口： 您有教中文的機會嗎？

石島： 我當時沒有教中文的能力(笑)。大概是能看學生版易讀中文史料的程度。

關口： 老師在茨城大學就職期間撰寫了相當多鄉土史文獻。老師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和我》之中，提及了當時因為前去中國的困難，以及無法在中國讀原始資料一事，因而閱讀保存在日本的原始資料，嘗試進行訪談的經驗。我覺得，如果中國研究以外，談談您的鄉土史研究也十分有意思。因此想要詳細地向您請教那樣的情況。

石島： 起因是參加水戶空襲戰災記錄的會議。雖然也做了些訪談，讀美軍的史料之類的事，寫寫原稿。告一段落後，在該會擔任顧問的東洋史前輩塙作樂（岩波書店從事編輯《世界》等書）問我願不願意來作關城町史（現築西市的一部分）<sup>2</sup>的編纂工作呢？ 因為編輯關城町史還認識了以中江兆民研究聞名的松永昌三先生等人。當中也做了面談。這鎮上保留了相當多的史料。

關口： 看著原文史料執筆好像是第一次啊。

---

<sup>1</sup>馬來西亞土著（馬來語：Bumiputra），在《馬來西亞憲法》下指的是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及沙巴和砂拉越的原住民族。Bumiputra 一詞原自梵文，意指地球之子或是土地之子，這是由於 Bumi 一詞有「土地」和「地球」之意。在馬來西亞，中文使用者一般都使用「土著」一詞來稱呼這些人。

<sup>2</sup>關城町（せきじょうまち）在茨城県真壁郡。

石島： 是啊。

關口： 史料是哪個年代關於什麼樣的方面呢？

石島： 我看的部份主要是戰後時期，內容很多樣，有農田改革、學校合併等等的史料。關城町是一個城鎮兩個村莊(關本町、河內村、黑子村) 合併而成的，所以有各地的獨特的風土，學校合併時發生過嚴重的對立，也面訪過那樣的事，真的非常有意思。

關口： 您訪問過什麼樣的人呢？

石島： 熟悉悠久的城鎮歷史了的人們、與城鎮的歷史有關的人們。有頭有臉的宿耆等各種各樣的人，也有村子的領導。全都是很有特色的人啊！(笑)。

大澤： 擔任編纂的是什麼組織呢？

石島： 是鎮上的教育委員會。當時是行政區地方史編輯的盛行期。日本史的研究者有許多參加編輯地方史當打工的人。茨城大學的情型比較特殊，因為研究者的數量不夠，像我這樣做中國史的人也來分一杯羹。

關口： 在茨城縣如果要編輯地方史，還是會想到茨城大學吧？

石島： 我想當時築波大學已經開始營運，但茨城大學與縣內各種各樣的歷史有所相關啊。我負責的是「關城町史」，之後因為在水戶市，所以也和「水戶市史」編輯有所關聯。因為「茨城縣史」的關係，我算是擔任了教育部門的工作。然後一起作「關城町史」的小田部雄次君(現靜岡福利大學、研究現代天皇、皇室、華族)問我願不願意一起來弄「龍崎市史」，所以也搭上點關係。

大澤： 編纂地方史時，不太會出現與中國相關的話題嗎？

石島： 是啊。只是其中，例如在做「關城町史」時，有訪問參加南京戰爭的日本兵。那人雖多少說了一點，但不怎麼願意詳說。

大澤： 在戰爭期間從中國所謂「強行運回(強徵壯丁)<sup>3</sup>」的事，不就正是發生在

---

<sup>3</sup> 譯註：指日本太平洋戰爭期間，將東亞戰場上虜獲的中國人、韓國人強制運回日本，藉以補充、強化日本勞動人口。

茨城嗎？

石島：我認為連茨城也有，鄰近的日立（日立礦場）也有。那與地方史編纂有關聯，但這樣的市鎮村史在某程度上是在某個人工的架構中書寫歷史。一旦如此，將原本在久遠年代完全沒有牽連的區域湊在一起，拼出一個歷史。我對這種事多少感到有些矛盾。本來所謂地方史是在有著某種程度的連續性地區的基礎之上，作成的東西。然而町村合併後的市鎮村未必有那樣的聯繫。現下在中國也很盛行編纂地方史，也差不多是這個調調。我因為在重慶有些人脈，收到了一本「重慶市史」，那本書也把今日擴大後的重慶市區總括起來寫成一部歷史。對這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因此我想在編輯地方史方面不斷會有那樣的問題出來。當然那樣的問題點也和工作伙伴們談過了，結論是，為了編輯鎮史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現下關城町和附近的鎮村合併為築西市。往後編輯築西市史時，也發生這樣的問題吧。

關口：與地方史有關的是這 4 冊嗎？

石島：是啊。最後在 2000 年出版的「龍崎市」，一直追溯鎌倉時代的龍岬。

關口：日本地方史編輯的潮流果然還是與明治百週年有關聯嗎？

石島：那是一個很大的起因啊。從那時起在各地都開始作地方史。

大澤：老師的弟子們畢業後有很多人在縣內成為教員嗎？

石島：是啊。然後做考古學的人在博物館就職。當然也有成為一般的上班族的人，各式各樣的。

大澤：在茨城大學的學生和地方史編輯的過程相識的人們對於中國有什麼樣的印象呢？

石島：因為還在與中國少有往來的時期，我想還是非常模糊的吧。也是因為不像現在一樣有各種各樣的利害衝突。是文革才剛結束的時候啊。

大澤：當時的學生對二次大戰有什麼樣的印象呢？

石島：沒什麼強烈的印象，課程盡量多提了戰爭的事。如果有影片就播放影片。對那樣的東西學生也有坦率地回應。在「中國抗日戰爭史」的講授也使用過，學

生的反應似乎是相當有趣。

關口：老師有希望學生「至少學這些吧」這種像是「課程核心」的東西嗎？

石島：戰爭問題就正是這樣的東西。然後 80 年代開始與中國的關係深化，因而盡量嘗試讓學生理解到中國問題。

關口：台灣難道沒成為主題嗎？

石島：有阿。我在台灣 80 年代民主化運動等傳播新聞中意識到了。

關口：老師您在茨城大學就任時正好碰到毛澤東過世的那年，是用什麼樣的心情面對的呢？

石島：雖是平常看待，但也感到一個時代結束了的心情啊。那時周恩來死了，朱德也是，而且有大地震（唐山）、轉眼間四人幫被放逐，心想當真來了一個大轉變啊。

大澤：您與政治變化都一貫地保持距離嗎？

石島：是啊。差不多只有和研究會同事議論的程度吧。

關口：毛澤東過世的前一年蔣介石過世了，對此您有什麼感想呢？

石島：聽到蔣介石的消息時反而沒有什麼感覺。「這是蔣介石的最後吧」的感覺吧(笑)。

關口：是報紙上寫的嗎？又或者是您有訂閱綜合雜誌嗎？

石島：是報紙吧，「朝日新聞」。之後我在圖書館的雜誌上看一下相關報導。

大澤：您訂閱中國台灣的雜誌嗎？

石島：沒有。

大澤：您參加抗日戰爭史研究會，那與「歷史評論」、「歷史學研究」這些期刊部

門有關係嗎？

石島：「歷評」也好「歷研」也好都有中斷過，但一直都有保持聯絡。但因為去茨城的緣故，不知是好是壞，都沒能成為歷研或歷評的委員(笑)。唯一的遺憾是，做過委員的人們，增谷英樹先生和吉澤南先生他們在商議後出版了一系列「新的世界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89年)。這書完成的背後有他們在歷研的討論，在做這件事時沒能聯繫上實在是憾事一件。

大澤：與抗日戰爭史研究會的先進交流以外，「講座中國近現代史」的編纂過程有過什麼交流嗎？

石島：那時候也召開過研究會，但沒那麼熱烈。我負責那卷的情況是以吉澤南先生為中心決定採用何種方針來進行。

大澤：您有參與歷史教育的運動嗎？

石島：我有去過歷教協會(歷史教育者協議會)的大會，但沒做過委員了。當然在高中教書過程中，對歷教協的活動保持一定的關注。

大澤：老師的研究主題從中國的知識分子轉變到南京國民政府、30年代的國民黨政權，其契機或是內在的動機是什麼呢？

石島：野澤先生曾介紹我關於戰前所謂中國統一化論戰的文獻，並閱讀矢內原·中西·尾崎的幾篇論文的過程中對國民政府的議題產生興趣。過程中也有「講座中國近現代史」的出版。一開始是想寫關於知識人的議題，但因為那主題已經有其他人寫過，所以決定寫起初有興趣的國民政府有關的議題。因為當時メリクセトフ (A.V. Меликсетов) 等人的研究出爐<sup>4</sup>，就總算是參考那些資料整理出來。那時我為《講座中國近現代史》和茨城大學的學報寫了兩本書。

大澤：現在對國民黨再評價的研究中，山田辰雄君和中島太一君的研究相當有名，您與這些人認識嗎？

石島：和山田先生從以前就認識了。中島先生是在之後參加幣製改革的研究會時，有邀請過一次中島先生。幣製改革的研究會是以木畑及小林英夫先生為中心 1977年開始的研究會，不久 70年代末起加上了野澤先生、今井駿先生和我。

---

<sup>4</sup> 莫斯科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專業為中國政治經濟。

大澤：以經濟史為中心的研究，您不會感到困擾嗎？

石島：有的。因為我沒有深入地研究過經濟史，非常擔心做不來，但不是將幣制改革僅僅理解為經濟問題，而從更寬闊的視野思考才是研究會的核心關懷，所以我以當時的國民政府與歐美諸國的關係與幣制改革有何關聯在這一問題上加進了論文中。過程也拜會了中畠先生並請教問題。

關口：研究會的大概多久一次？

石島：我想大概每個月一次。也舉行過集訓。這研究會即便今日看來也是很棒的研究會。因為是聚集這麼多領域的人議論一個主題，並把它整理成一本書。毛里和子替我們寫了這書的書評，說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同研究。我也這樣認為。自己的論文暫且不論，整體而言這本書相當優秀。

大澤：您和野澤老師是從那時開始有交流的嗎？

石島：和方才多少說過的一樣，從野澤老師在教育大學當助手時起，在與柄木和今井先生他們聯繫過程中到拜訪了教育大，也漸漸變得與野澤老師熟識。雖說那時候我覺得已經是有點年紀的老師了。我沒有參加野澤老師轉任都立大後的研究會。

大澤：您在執筆「中國抗日戰爭史」時經常出席的，是中國現代史研究會、民國史研究會、日本現代史研究會等等嗎？

石島：雖說是中途才參加的，但確實是。有自己關心的議題時會參加。此外雖沒有成為歷史學研究會的委員，仍在1979年的歷研大會上發表報告。另外暑期研習營和冬季研習營都很常參加。因為在水戶那樣的機會很寶貴啊。當時暑期研習營是跨越領域日本史・東亞史・西洋史的研究者齊聚一堂，每年都連續幾日含住宿進行相當大規模的會議。但某次之後西洋史的學者們就開始自己的暑期研習營，不久原本的研習營就慢慢變成以日本史為中心。現在想到就覺得可惜。繼續跨越領域的討論明明比較好。西洋史的人們真不知足呢。冬季研習營或許是以滑雪和喝酒為重心的(笑)。但相當的開心。

關口：在茨城大學有和同事組成研究會嗎？

石島：有阿。大概在八十年代前後，一樣研究歷史的同事。西洋史的伊集院立先生、奧地利史的佐藤勝則、在日本史這塊是松永昌三先生等等。

關口：內容是甚麼呢？

石島：各式各樣的呢，現在想到的是大家一起讀山之內靖的「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像」(未來社、1969年)。

關口：還是理論的東西比較多吧？

石島：是啊。

大澤：您在成蹊高中時的工會運動，感覺怎麼樣呢？

石島：包含從成蹊高中的國小到大學的工會。我在運動的尾聲也做過工會的委員長。

關口：具體是被怎樣的活動？

石島：因為無法加薪，是獎金抗爭等為中心吧。

大澤：這與那時候社會上的關聯呢？

石島：雖然沒有那樣的事，那時工會活動相當盛行。我參加過 10.21 國際反戰運動等等的集會。參加過早朝布條，帶子鬥爭(戴上臂章・頭帶・標語等，其上寫著

訴求事項示威抗議)、的集團勞資談判什麼的。成蹊因為是三菱派系的，所以比較保守。

關口： 您是全家搬往茨城嗎？

石島： 是啊。我騎單車到學校通勤。

關口： 您有把學生叫到家裡來的事嗎？

石島： 很常來阿(笑)。還是地方大學的關係比較親密啊。茨城大學在外租房子的學生很多。有會穿著木屐，和服短衫來學校的學生(笑)。只是茨城大學並不是在當地扎根扎得那麼深。茨城大學本來就是統合水戶高中學校、茨城師範學校、茨城青年師範學校、多賀工業專科學校，此外把茨城縣立農業科學大學合在一起的大學，所以校園分成三個，沒有統一性。

關口： 您是在茨城大學任職時第一次去中國吧。

石島： 是的。是 1982 年的事。

關口： 您要去中國時，有學中文嗎？

石島： 我去之前有學過，實際上運用時深深感到派不上用場。之後還多少覺得如不認真的學中文就完了。但四十歲才起步練習，也不可能多熟練(笑)。

關口： 您是從上海進入中國嘛。

石島： 踏上人民中國（中國大陸之意）時頗有感觸。當時的上海機場是灰暗且闐靜的氣氛(笑)。基本上交通手段是自行車，在北京也常見牛車。

大澤： 這次訪問是關西的現代史研究會所準備，是怎麼選成員呢？

石島： 他們組成核心向朋友們發出邀請。對我們來說是能去中國的絕好的機會。而且不是觀光旅遊，也會進行學術交流，就興高采烈去了。訪問外國也是以這次為第一次。

關口： 第二天在北京時您有到盧溝橋・軍事博物館訪問吧。如何呢？

石島： 還是感慨很深啊。和現在的博物館不同，當時只是小展示室。感覺離整備好還差得很遠。

大澤： 出發之前發生教科書爭議吧。

石島： 因此旅遊期間也經常成為話題。我想問題主要是出自日本這邊。

大澤： 您有感受到社會主義嗎？

石島： 雖然那樣還是出現了一些自由市場，成員之一的奧村先生等等說了：「啊，有自由市場」還前去參觀(笑)。此外男性的領隊義正辭嚴地說：「人民公社絕對不會倒！」，那年年尾人民公社就消失了(笑)。衣著也是人民服，非常樸素。

關口： 老師之後再次訪問中國是什麼時候？

石島： 1984 年參加南開大學關於抗日根據地的學術研討會。

關口： 為了學術訪問占出國的絕大部分嗎？

石島： 是啊。當然因為變得能自由地去中國，所以這世代比我們年輕一代的研究者有很多遊學的人。以 1987 年在南京的「民國檔案和民國學術討論會」和久保君們以自由參加的形式參加了，那時土田君和高田君在南京大學遊學。其間，在 1985 年也訪問了台灣。

大澤： 《中國抗日戰爭史》也在這時(1984 年)出版，您從什麼時候開始準備的呢？

石島： 因為《抗日戰爭》的論文是 1979 年寫成的，所以我想大概是 1982 年左右。雖說沒記住確切時間。

關口： 從《中國抗日戰爭史》的後記來看，這本書的內容是以向來論文的成果為基礎重新寫作，這與在茨城大學裡的授課沒有關係嗎？

石島： 完全沒有。茨城大學的授課沒做那麼深入的講述，而是概述性質的處理。是 1982 年的教科書問題成為寫作動機而動筆的書這點上沒錯，所以認真開始寫的大概還是從 82 年開始吧。幸虧當時是沒有那樣多的研究的時期，所以能相當網

羅地整理當時出版過的東西。

大澤： 您對所謂 81、2 年的教科書修正問題怎樣理解的呢？

石島： 還是對這種事的發展感到危機感。

大澤： 當時有再保守化和戰爭漸被遺忘這樣的事嗎？

石島： 有。 當然我認為這種事會是一直重覆發生，反覆被討論的。 紀元節問題也是那樣。 到了 80 年代發生教科書問題，我認為研究者同事間很多意識到問題的嚴峻化。

關口： 與這個話題有關，在《中國抗日戰爭史》後記中出現了「帶有硝煙味的今日局勢」這樣的表現。具體是指什麼樣的事情呢？教科書問題的事嗎？或者是意味中曾根內閣等的一系列的趨勢呢？

石島： 一定是意識到將「侵略」改寫成「進出」，以及美化戰爭的動向。另外被視為是鷹派的中曾根內閣在 1982 年 11 月成立，隔年 1 月中曾根首相訪美，與同樣是鷹派的雷根總統發表「日美命運共同體」，還說「日本列島不沈航空母艦化」。此外在國會也聲明「戰後史很大的轉捩點」。現在來看的話就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吧(笑)，當時有種日本打算變成能發動戰爭的國家的感覺。就是「硝煙味」那句話的意思。

關口： 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來茨城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呢？

石島： 80 年代中左右吧。 現都還有聯絡，有研究日語的研究者過來。現在人在清華大學。 88 到 89 年在中國留滯的最後期間我也有把在上海相識的年輕的研究者邀請到茨城大學。就是陳祖恩先生。即便如此我想與東京相比茨城大學的留學生沒有那麼多。

關口： 您在 1985 年 7 月第一次訪問台灣，怎麼樣呢？

石島： 我的目的是學術交流與參加和戴國輝先生有關的對政府進行批判的集會。在台北逗留，乘巴士去台中，縱貫台灣返回台北。在台中從車中看到行政院國軍退休官兵輔導委員會福山農場。從大陸搬遷來台的國民黨軍人在退役後這兒工作的緣故。以下是那時台灣旅遊的概要。

來自日本的參加者

戴國輝、姬田光義、粟屋憲太郎、森正孝、石島紀之

主要的日程

7月6號

近現代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輔仁大學

報告者：許介鱗、蔣永敬、李雲漢、日方全體成員。

我以〈在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的動向〉為題進行報告。

7月7號

七七抗戰紀念講演會：於國軍英雄館

主辦 中華雜誌·文季雜誌·夏潮論壇

主保持人：陳映真

講演者：胡秋原、日方全體成員。

我以〈抗日戰爭史之研究與日本人〉為題發表演說。

用台中旅遊進行訪問的農場名稱：行政院國軍退休官兵輔導委員會福山農場

此外《中國雜誌》的發行人是福建人民政府的參加者，也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委員的文化史學家胡秋原先生，當時非常有精神。

大澤：和戴國輝先生是怎麼樣相識的呢？

石島：80年代受粟屋憲太郎先生的委託我以兼任的資格在立教大學的研究所上課時認識的。伊香俊哉是當時的研究生。我想他之所以開始中國研究大概是因我之故。

關口：進入台灣時的心情怎麼樣？

石島：在機場中國民國的旗排列成行，還真有「來台灣了」的(笑)感覺。我們下榻在宋美齡的圓山飯店(笑)。因為飯店的規模而吃了一驚啊。

大澤：在中國您沒注意到旗子嗎？沒有毛澤東的照片嗎？

石島：有旗幟啊。也有毛澤東的照片，銅像到處都是。當然台灣與在中國時感受了不一樣的印象，雖說哪裡不一樣不知道怎麼說才好。在台北參加批判政府的集會時，雖沒有直接指名批評政府的發言，但主辦者合唱抗日戰爭時期的歌。這不

就是針對不徹底批判與日本間的戰爭的國民黨政府所做的批判？

大澤： 是台灣語的集會嗎？

石島： 不，是所謂北京官話。在台灣看到電視上出現字幕時吃了一驚。用閩南語的話，我們這些只說標準話的人會聽不懂。

關口： 會日語的人有很多嗎？

石島： 是阿。和幾個人聊過，並沒有那麼多的感覺。這次台灣旅遊很有意思。

關口： 您在台灣還有參觀其他地方嗎？

石島： 沒去故宮博物院，蔣中正紀念堂、總統府也只是從車上窺探的程度。這時候也沒有去台灣大學。

關口： 之後您又在什麼時候去台灣的？

石島： 2003 年。SARS 成為問題的時候。

關口： 大概有所間隔了吧。隔了有 10 年以上吧。

石島： 是啊。李登輝的時代結束，變成民進黨政權。

關口： 從 1988 年到 89 年期間您在中國長期留滯，想請教那時候的事。

石島： 我被日本學術振興會派遣去北京。在北京從 5 月 25 起最初待在天壇附近的飯店，因為離經濟研究所很遠，所以 6 月初搬到燕京飯店。在北京是與吳承明先生、鐵路史的宓汝成先生、朱蔭貴先生和蔡德先生金等交流。9 月去天津與姬田先生，丸田孝志先生及三谷孝先生等會面。10 月 17 號起搭飛機去成都。在成都(10 月 17 號到 11 月 19 號)使用了四川省檔案館以外，也和當地歷史學家們做了交流。作為外國人我是最早的。後來去了四川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和崔國華先生們交流。在重慶(11 月 19 號-12 月 8 號)利用市圖書館外，也和當地的歷史學家們交流。12 月 9 號、前去昆明( 12 月 9 號- 16 號)，和日後寫作《雲南省的歷史》承蒙關照的謝本書先生交流。和他曾在民國史的學術研討會上見過面。在貴陽(12 月 17 號-29 號) 和研究者們交流。檔案館位置偏僻，整理期間不能閱覽。12 月 29 號回到北京

(1月31號為止)、在當地與研究汪精衛政權的蔡德金，楊奎松，和張海鵬們交流。之後短期到上海一趟完就待在南京(2月2號到3月20號)，受到張憲文先生受的關照。主要是在第二檔案館看史料。3月7號回上海、與復旦大學的黃美真和當時是研究生現在來大東文化大學的鹿錫俊、現代史研究所的丁日初、楊立強先生等等交流。然後在3月22日從上海回到日本了。《近在咫尺》(近きに在りて)第17號上有西南的遊記。一個人在西南地區背著沉重的行李來回。交通不方便十分困擾。

關口： 就連現在也不怎麼可以用輕鬆的心情去西南啊。

石島： 是啊。當時腳可痠了啊。從成都去重慶時搭了15人坐左右的飛機，好不容易飛抵重慶已經過中午了，沒有人來接機。當時的重慶機場還很小，再加上離市區相當遙遠，走投無路時，幸虧附近的中國人為我們打了通電話給社會科學院，才好不容易來接我們了。好像是上午來迎接，等不到飛機所以回去了。從重慶去昆明的時候搭火車。到了貴陽，果然沒半個人影來迎接。這次好像完全沒有聯繫。因此想叫計程車搭到社會科學院，找個住處。從貴陽回北京時壞天氣持續不斷，有三天左右動彈不得。真不是鬧著玩的。

關口： 那時是第一次在中國自助旅行的吧。

石島： 對。但幸好有那次經驗。多虧這一趟徹底學會在中國生活的方法，中文也相當有進步。

關口： 您在車站也排隊買票嗎？

石島： 只有買票這事社會科學院幫忙安排了。這點上實在非常感謝。夏天時家人來到北京，之後去大連玩，接著去上海時，沒半個人在上海(笑)。因為在晚上上海機場空無一人，只好搭上氣氛詭異的計程車，「總之請帶我到可以住的地方去」(笑)。帶著孩子們(12歲和8歲)的關係，記得一路上心情都很緊張。最後被帶到像招待所一樣的地方。

關口： 到大連是搭飛機嗎？

石島： 當時是飛機吧。

關口： 您在中國最北到大連嗎？

石島： 長期留滯的時候是那樣的，之後在 1991 年九一八 60 週年時，和日本史的今井清一先生們到瀋陽參加學術研討會時，乘列車和今井先生們到過長春、吉林、哈爾濱。

大澤： 88 年的話，還在用外幣兌換卷吧。

石島： 當然阿。當時要「兌換」成人民幣。

關口： 這時您的薪資是怎麼支給的呢？

石島： 從社會科學院收了現金的人民幣。不記得每個月多少。確實是能充分生活的額度。我想沒記錯應該是王府井的中國銀行，當時除了存錢的地方外沒敢露出錢來(笑)。那可真是開玩笑的。

大澤： 88 年左右的通貨膨脹等有什麼影響嗎？

石島： 那當然有。壓迫到庶民的生活，大家都在說對「那個」的不滿啊。所謂「那個」就是「官倒」的問題。那樣的不滿漸漸擴大與天安門事件也有關聯。可以感受到那樣的跡象啊。社會科學院的人們也過得很辛苦。因為那兒也是「單位生活」。飯也是在社會科學院的食堂吃。幾毛錢就能吃飯了，按季節不同偶爾帶來獲得的魚，或是入手的西瓜等…。當時是那樣的氣氛阿。經濟研究所在文革時，也有失去家產就那樣全家一起生活的人。經濟研究所靠近月壇，從燕京飯店走 15 到 20 分鐘左右的距離。

關口： 您在什麼地方感受到人們的不滿？

石島： 首先在年輕研究者和日常往來者間的談話中。其他像飯店的服務生等和各種人說話時都不容分辯地鑽進耳朵裡。

大澤： 88 年左右沒有示威活動嗎？

石島： 至少沒有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的。發展成天安門事件的巨變是在 3 月，那時我人已經回日本了。因此心裡想說才一回來就發展成這樣了啊。如果人還在燕京飯店的話有多可怕阿？因為示威隊伍和解放軍衝突的地點，就在眼前。

關口： 都在燕京飯店拿到報紙嗎？

石島： 每次都在街上買的。房間內有裝電視。那時正好在播放《河殤》。

關口： 老師身邊沒有像在監視的人嗎？

石島： 那個倒沒有。完全自由(笑)。

大澤： 對於文革和毛澤東的批判有很普遍嗎？

石島： 年輕人們是很露骨地那樣說了。對於單方面增強的拜金主義傾向特別在上年紀的人們身上感到不滿的情緒。

大澤： 您心中向來的中國像在長期留滯後有改變嗎？

石島： 我心中向來只有人民中國的印象。不過實際在當地生活過後，常有不排隊插隊的事…(笑)。總是看到那樣的的事，就心想「這到底是什麼鬼地方」(笑)。另一方面，往來時都很親切，充分感覺到人間的溫情啊。我認為若非如此，一個人的生活還是很辛苦的。一個人在飯店的餐廳吃飯真是冷清。量也多(笑)。

關口： 留滯期間一般的生活步調怎麼樣呢？

石島： 現在也還是一板一眼的，早上7:00 起床、用餐，出門去研究所。在飯店吃早飯，習慣以後也會到附近吃。但不像現在一樣有那麼多可以安心吃的地方，加上燕京飯店附近也很少有。燕京飯店的早餐基本上是中式的，也有西式的，價格並不便宜，這點上有點麻煩。中午在研究所的食堂吃。9:00 去圖書館一直待到傍晚都在讀史料之類的渡過。晚飯就一個人吃。

大澤： 有去過王府井嗎？

石島： 當然去過，但特別去王府井也就…。因為很花時間吧。(靠近復興門站)也不是地下鐵到不了的地方。之後比較有日本研究者來到北京。小姬田先生也來了，丸田先生也是那時介紹給我認識，還有田中仁、西村君、副島君、山田辰雄君先生等來過吧。日本史的研究者也來了幾個。姬田先生當時人在天津，來北京時還住過我的房間。

關口：您在北京市內逛過什麼地方呢？

石島：有王府井、琉璃廠，當然故宮也去了。還去看了胡同。

大澤：那時是以什麼研究主題在尋找史料呢？

石島：那時想要做西南地區的題目，所以想盡量看看中日戰爭時期的西南地區相關的史料。「昆明的國營工場」的論文(93 年)是以在經濟研究所看的史料為基礎寫的。因而活動範圍雖在北京，去西南地區旅遊仍是很大的目標。

大澤：聽說您被派到中國以前就是以西南地區為研究主題。

石島：是的。也就是所謂國民政府統治區域。

大澤：您沒考慮去成都留學的事嗎？

石島：雖然當時也可以去成都留學了吧，但沒有門路（つてもなかつた）。考量到在北京有吳承明這樣的熟人，與社會科學院的關係，首要還是把在北京活動比較好。當時在建國門外有社會科學院的建築物，在那先把各種手續辦了。

大澤：出版「中國抗日戰爭史」時特闢出一章來討論，是怎麼一回事呢？

石島：其實阿。在 70 年代寫作關於國民政府論文的過程中產生了興趣，此外也因為該領域的研究落後於全體，所以想先試試看那個題目。之後變得如果打算做中日戰爭時期的題目，就必須做西南地區。

大澤：所以說先生是這領域的先驅者吧。

石島：能不能說是先驅我不太清楚，但還沒什麼人在做阿。

大澤：其他先進的評價怎麼樣呢？有表現出特別的青睞之類的嗎？

石島：沒有那樣的事呢(笑)。

大澤：為什麼很少有做西南地區的研究呢？雖然我認為到了 80 年代再評價國民黨一事成為主流。

石島： 為什麼呢？會不會是相較於中日戰爭時期更前面的時代，南京時代的研究比較多阿？我認為相比之下中日戰爭時的研究落後了。關於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不就是以那時候的研究為中心嗎？

大澤： 《國民政府史的研究》是 80 年代後半的研究。

石島： 菊池先生等也寫過中日戰爭時期的事，但還是研究在之前的時代為主。我是本來就對中日戰爭時期感到興趣。

關口： 您在四川省檔案館閱覽時，需要辦什麼樣的手續呢？

石島： 那時社會科學院幫我辦好手續。因而能相當自由地閱覽。雖然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後悔，如果當初問題意識再稍微明確點就好了(笑)。因為能利用檔案室的事我事先沒能知道。四川省檔案館已經來了一個美國女性(ゼルリ，研究清代的經濟史)，據說我是僅次於她的外國人。我在重慶市圖書館閱覽報紙(原紙)。因為是古老的建物保存狀況非常不好。但圖書館的人非常熱心。雖然重慶有檔案館，我想那時還沒對外開放。

關口： 您在重慶是去了國民政府舊址嗎？

石島： 去過了。周勇的父親周永林先生陪我去重慶的街道。是 38 年入黨的共產黨活動家，在周恩來麾下活動的人。非常優秀又親切的人，一直陪我走遍街道，跟我說，「這裡是國民參政會的舊址」。真是不知如何感謝啊。也因為這樣緣份與周勇先生…。當時以研究為主的年輕研究者(笑)。現下好像忙於行政。

關口： 這時候前田哲男《轟炸戰略的思想—格爾尼卡、重慶、廣島》(朝日報社、1988 年)已經出版了。

石島： 已經出版了。只是在重慶的重慶轟炸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研究者嘆息：「好像賣不了錢。」《轟炸戰略的思想》刺激之下開始研究的啊。連在重慶的周永林先生也邀請召開座談會，西南師範大學的黃叔君先生說有在研究重慶轟炸，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出書。2、3 年後雖是本薄薄的小冊子，仍是最早出版關於重慶轟炸的書。當時是那樣的狀況。關於國民政府的抗戰還沒被好好地評價過。

大澤： 前些年奧村先生去貴陽的檔案館時，好像也是在外國研究者中「排名第幾」

的感覺。

石島：我記得，貴陽是在我經過的西南都市中非常貧窮的地方都市。食物最辣的也是貴陽(笑)。非常非常辣，真的(笑)。還有大概在情人分離時吃的所謂的「戀愛豆腐」(笑)。大部分的東西我都能吃，就這個不行。

關口：從2月2號到3月7號在南京逗留，這時候您下榻在哪裡？

石島：住宿是雙門樓賓館。

關口：雙門樓賓館曾經是英國領事館。現在是江蘇省的招待所。

石島：因為正好撞到春節的時期，客人是一個都沒有，非常寂寞。給張憲文先生招待了一個晚上。

關口：從沿長江的雙門樓賓館到第二檔案館有好一段路吧。搭計程車去嗎？

石島：我盡可能利用公車。現在也是，心裡惦記著盡量不搭計程車之類而用走的。連南京都下了雪，第二檔案館也沒有取暖設備，冷風直直吹的閱覽室非常寒冷，印象中還把懷爐抱在身上。剛好與副館長萬仁元先生是舊識，額外給我看了很多史料。

關口：萬仁元先生也從事編輯《民國職官年表》對吧。您在南京去了其他景點嗎？

石島：我去了中山陵等等啊。

大澤：那時候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弄好了嗎？

石島：可蓋好了啊。84年時在日本藤原彰先生、本多勝一先生、江口圭一先生、新進有吉田裕先生、中國史領域的井上久士先生、古廩忠夫先生、笠原十九司先生、還有律師們組成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隨後馬上訪問南京。那時紀念館還沒有蓋好，聽到了「什麼時候要在這建紀念館」之類的話。。

大澤：在82年時一年內去好幾次中國，在研究者來說是普遍的嗎？

石島：我覺得是。姬田先生等等不也是更頻繁地來往不是嗎？我想姬田先生在80

年代滯留在中國 2 年左右。另外也因為南開大學的抗日根據地的學術研討會和南京的民國史的學術研討會都一定是好幾個人一起去的吧。

關口：看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您有什麼樣的印象呢？

石島：相當了不起，有這樣的印象吧。因為在以前一群人待在有人骨的地方的關係吧。終於到了完建的這一步了的感覺。那時有交流的稱為段月萍的女性，在 89 年出任館長。落成紀念館前是片草原。記得確實有骨頭露出來。會建成那樣紀念館的一個起因，我想大概與我們去看了也有關吧。還有當時日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很進步這點上吧。我寫在講座關於抗戰力的論文，在 80 年代中期丁日初先生覺得挺有意思的，由上海的經濟史的雜誌翻譯後刊載了。我使用的史料都相當平常，據說是從新的觀點出發才獲得好評的。記得丁日初先生先是問過：「不能評價為是國家社會主義嗎？」，隨後說「即使那樣想，在中國還是沒辦法發表這種作品」。但之後不久丁日初先生和沈祖煒先生一起在《近在咫尺》第 10 號上刊登了關於國家資本的論文。因此在中國還不能說的事，先在日本說了，他認為帶來影響的事例還有太多。

關口：以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來說的話，本多勝一先生的相關研究影響大嗎？

石島：是啊。除此之外也有藤原彰的研究。我只去過研究會一次，但他們實施 2、3 次的實地訪問。我想那樣的的事某種程度上很有影響。

大澤：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您從一開始就參加的嗎？

石島：是啊。稍微晚於創立一點參加，每個月聚集在靠近飯田橋站的律師事務所中進行研究會。

關口：由偕行公司出版的《南京戰史》也是這時候吧。關於《南京戰史》您是怎麼想的呢？

石島：在當時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也成為話題了，編集者有良心地承認有一定程度的虐殺行為。要說那樣評價可以的話，也是可以。我們也出版了《南京事件資料集》了。第 1 卷是以笠原先生為中心編輯歐美由其是美國的史料，第 2 卷是古廩先生，井上先生還有我 3 人為主翻譯了關於中國南京事件的文獻。

關口：現在由南京大學出版的專書像山一樣地多吧。

石島：相當了不起啊(笑)。在那個研究會上研究繼續南京事件的是笠原先生、日本史領域的吉田裕吧。本多先生當然也有參與。

關口：然後您就經由上海回國了吧。

石島：是啊。這時在上海復旦大學裡演講。一開始用中文講，不能好好回答時，讓鹿錫俊口先生幫我口譯了。在上海時下榻在錦江飯店。

關口：當時上海沒有地下鐵吧。

石島：沒有。那時是上海的交通情況是最惡劣的時候。非常可怕的阻塞，單是一次公車進站，就需要花上可觀的時間，更別說搭公車本來就很辛苦了。

關口：那時也沒有高速公路吧。

石島：什麼都沒有。上海圖書館也在市中心。只是當時不能利用。檔案館也是老舊不已，只訪問過了一次。今日檔案館的前身是在虹橋，是在更之前的時候(舊檔案館)。(因為是老舊建物，完全不是能利用的狀況。之後在近現代史研究所進行一些交流，然後去復旦大學。

關口：老師的 10 個月中國留滯期間是茨城大學的休假期吧。

石島：是的。

大澤：藉由這 10 個月的逗留，您有感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史研究仍是有待發展嗎？

石島：但我想很大部分在於對國民政府的評價有所變化。大概是成為可以對話的印象。

關口：您在返回茨城大學後不久發生天安門事件吧。老師當然在電視上看到了吧。

石島：感到很震撼啊！那時好幾人一起發表了抗議聲明。然後暑期研習營上發表了與刻意與這問題連結的「抗日戰爭和中國的民主主義」的報告。我不覺得會因為天安門事件中國就崩毀吧，但也是處在非常危險的狀況。也不覺得能走到改變

政治體制的地步。不是那樣容易就能做到的。

大澤： 那是在什麼面向上呢？例如山田辰雄先生等表達的不動員農村就無法成功的意見。另一方面也有認為在中國不可能有像天安門事件一樣，在那方面上跌破眼鏡的人啊。

石島： 山田先生當時是處之泰然啊。「即使抗議，也不太有意義」的立場(笑)。因為我實際上知道在中國都市居民的不滿高漲，所以不覺得是突然發生了不可能事。只是當然沒想到會真的演變成那種規模，發生了那麼大衝突。我覺得是民主化的浪潮和居民的不滿等的其他趨勢相結合後表面化的結果。

大澤： 天安門事件發生時茨城大學裡有中國學生或教員嗎？

石島： 沒時沒有。在3月被黃美真介紹的陳祖恩先生才來。沒有幫忙流亡的事發生。

大澤： 您發表了對天安門事件的抗議聲明，也參與了久保先生和西村先生關於中國民主主義的書嗎？

石島： 一起寫了。負責其中一部分。

關口： 是反對用武力鎮壓的立場吧。

石島： 還是應該要應該尊重民主主義的主張，並加以援助的觀點吧。

大澤： 日本的媒體也充斥著「中國是危險的國家」這樣的看法，您是怎麼想的呢？

石島： 我在學生裡邊沒有感到這回事。

關口： 您以前覺得說解放軍有可能對人民發起攻擊嗎？

石島： 我還是想不到會發展成這麼大規模的衝突。

關口： 這點上，雖然我不覺得老師原本有什麼想像，但有什麼幻滅嗎？

石島： 或許有幻滅。

大澤： 那有給您後來的研究帶來影響嗎？

石島： 我覺得沒有直接反映在研究上。因為並不是研究當代的事啊。但變得對共產黨的政治的模式採取批判性的看法。只是之後也繼續進行西南地區的研究，沒有直接反映在研究上吧。

關口： 發生天安門事件的 1989 年是從昭和跨到平成的時期，您是用怎樣的心情迎接了昭和的結束和平成的到來呢？

石島： 因為正好人在中國的時候，流入中國的信息中，感受到日本被沉重的空氣所覆蓋，所有人一起捲入其中般的印象。頗感到擔憂，日本到底變得怎麼樣了。我想恐怕和現在全世界的人看待核電廠爆炸的問題是一樣的狀況吧。

大澤： 比起昭和天皇遲未清算戰爭就過世…

石島： 那個當然有批評，但比起那個最嚴重的是天皇制竟然這麼大範圍籠罩日本的社會，對這樣的事感到擔憂。人在外國很難掌握日本的資訊。

大澤： 在中國您是看 NHK 的節目？

石島： 那時還沒辦法。因此日本的新聞都是透過中國的頻道。連日本的報紙都讀不到。經濟研究所也沒有。

大澤： 天皇過世一事除了中國的一部分人以外都不知道吧。

石島： 是那樣沒錯。

關口： 雖然和天皇沒有關聯，您在《中國抗日戰爭史》最後寫到對父親的感情。您父親當時還健在嗎？

石島： 父親是在 1992 年過去的。進入平成時還健在著。

關口： 依上回談話內容，您談到父親學生時代有做過貧民救濟(settlement)的活動，就職 NHK 後逐漸保守化，退休後又有點恢復舊慣。

石島： 是啊。保守的氣質泰半消失，也認同我們做的事。

關口： 您父親對昭和天皇的回憶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石島： 我覺得對天皇是抱持尊敬的心情。在節日會升起太陽旗了。在我還是學生的時代，因為爸爸的吩咐在家裡升起旗子，仁井田先生看了後說：「為什麼把那種東西升起來？」(笑)。如果哥哥說「小天皇」之類的，他就會生氣(笑)。也對我出版《中國抗日戰爭史》一事感到高興。

大澤： 89 年是冷戰結束的年代，您有怎樣的感慨嗎？

石島： 當然那時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所以衝擊是一個接一個。我還是一直在思考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包含中國的問題在內。

關口： 您有和學生談到那樣的事情嗎？

石島： 當然有阿。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學生們非常受到相當的衝擊，到底說了什麼話已經記不得了，確實是經常成為話題。

關口： 這時期有對張學良的訪談，您是怎麼看待的？

石島： 一邊覺得非常有意思一邊看。西村先生參與相當多啊。在 84 年南開大學抗日根據地的學術研討會後，和姬田先生們一起去了西安和延安。因為那時在西安姬田先生想要找出張學良的司令部，所以一起找了。當時是相當荒廢的大樓。聽說現下變得非常體面。延安也沒有像現在一樣地觀光化。雖然是「毛澤東們在這樣的地方生活過」的印象。全忘了胸中的熱血了(笑)。

關口： 蘇維埃聯邦在 92 年瓦解，對老師來說沒有失去精神支柱嗎？

石島： 那可沒有。那時帶著距離觀察著。就算有的話，也是學生時代。之後就不抱持那種幻想了(笑)。

大澤： 有感覺到中國在社會主義下變為新的社會嗎？

石島： 到文革開始為止那樣的感受很強烈啊。文革過程中那樣的意識又逐步地減弱了。到成蹊高中就職時文革開始。文革是一大衝擊吧。

大澤： 您什麼時候開始質疑文革的？

石島： 67 年以後慢慢開始質疑啊。批判文革的文獻、讀賣和產經的報導一直是批判的立場。因而變得能夠試著比較一下那樣的觀點。自己到書局找資料。然後發生武鬥也是影響很大啊。

關口： 90 年代您由茨城大學調職到費利斯女子大學(Ferris University)吧。

石島： 94 年調到費利斯大學。接著是從中國回來以後馬上變成大學入學測驗世界史的命題委員(89 年 90 年)。因此非常忙碌啊。御茶水女子大學的窪添先生在中國時曾通過電話，說了「能否來接替我的教職阿？」，而無法謝絕(笑)。做了 2 年的世界史命題部會的部會長。

大澤： 您在茨城大學從 76 年到 94 年間擔任過什麼職務和忙於什麼事呢？

石島： 長時間當了入學考試相關的負責人了。幸好沒成為系主任。不過相當地危險(笑)。也做過學科主任。

關口： 為什麼老師調到費利斯女子大學(Ferris University)？

石島： 有家庭等的考量，希望調到這邊來阿。正好 89 年在上海的復旦大學舉行法國大革命的學術研討會時與柴田三千雄先生認識，會後向我提出邀請。在茨城要去東京，還是有不方便的一面。要走常磐線或者高速巴士吧。僅限於非去東京不可的時候才會去。我去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駒場) 時，都要住宿。

大澤： 有茨城大學時代的回憶嗎？或者從 70 年代到 90 年代期間學生的變化之類的事。

石島： 學生粗野的氣質變淡了。只有學生和教師間情感強度持續不斷。為了荒井先生的後任，我找了吉澤南先生。我認為這也是一個貢獻。